

城市经济改革研究丛书

论我国的价格改革

田 军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中国价格改革理论与实践

论我国的价格改革

编 李树德

中国物价出版社

城市经济改革研究丛书

论 我 国 的 价 格 改 革

田 军 著

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李 育

封面设计：陈 乾

论我国的价格改革

田 军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5 字数：120千字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定价：1.05元

统一书号：4395·19

丛书说明

中央领导同志一再指出，当前我国正在深入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革命。

正如任何一场革命一样，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十分需要理论。尽管理论与实践并不一定齐头并进，有时实践还会走到理论的前面，例如前几年我国农村的改革便是如此。但如果我们不能对改革的实践加以理论上的研究，对今后的改革加以理论上的指导，那么实践的脚步也就会放慢，甚至停顿。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的改革进入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新阶段。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有着十分不同的特点，城市是大工业的集中地，是国家政治、经济机构的所在地，是原有体制的大本营。要对复杂的、有着内在联系的旧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离开了经济科学、哲学、社会学的深入探讨，离开了古、今、中、外的比较研究，离开了各种观点和方案的百家争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农村的改革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经常地拿出生动、新鲜的调查报告来不断推动改革的话，那么城市的改革仅此就远远不够了，它更需要大量的理论分析、学术探讨、方案比较以及思潮碰撞。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和北京经济研究所的帮助下，在多次的城市经济改革讨论会的基础上，形成了编写、出版《城市经济改革研究丛书》的基本构

想。

本丛书力图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

本丛书力图侧重理论探索，而不是他人编述的整理；

本丛书力图以立论取胜，而不以材料丰富为长；

本丛书力图风格多样，而不求体例上划一。

在近百选题中我们精选了二十余个选题，争取在1986年出齐。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丛书中的各个作者有着相同的倾向，近似的学术观点，尽管编委会安排的学术交流和编者、作者的切磋，消除了一些不同点和误解，深化了大家的认识，但各个作者仍有着对理论问题的不同看法。编委会本着百家争鸣、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这些差异都保留在丛书中，在这些地方，这些独特的观点既不代表编委会的看法，更不代表其他作者的意见。我们相信读者将会喜欢这种做法。

探索不可能是完备的，唯其不完备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如果本丛书的出版，能够引起各界的关心和批评，我们就会为能够推动对改革进一步的理论探索有所贡献而欣慰。

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五年六月

序 言

价格工作是一门科学，它需要有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由于过去长期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和其它历史原因，我国现行的价格体系相当紊乱，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映供求关系。因而价格体系必须进行改革。而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科学的价格理论体系，是加强和改革物价工作，提高其科学性和有效性的迫切需要。田军同志撰写的《论我国的价格改革》一书，在改革我国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我国价格改革牵动着各方面，必须综合考虑，慎重进行。价格改革的内容很多，头绪繁杂。几乎每一项经济改革都会涉及到价格的问题。从指导思想上来说，主要是改革旧的传统观念和旧的习惯做法。当然，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地改革和完善现行的价格体制，并不是割断历史，简单地否定过去的一切，而是扬弃，是寻求发展。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价格改革的原则是：第一、按照等价交换的要求和供求关系的变化，调整不合理的比价，该降的降，该升的升；第二、在提高部分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的时候，加工企业必须大力降低消耗，使由于矿产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的成本增高基本上在企业内部抵销，少部分由国家减

免税来解决，避免因此提高工业消费品的市场销售价格；第三、在解决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和调整消费品价格的时候，必须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广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不因价格的调整而降低。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工资还要逐步提高。我们要本着价格改革的原则，对各种价格采取先易后难，逐步放开。由于市场开放，两种价格并存，突破了僵化的价格体系，使价格逐步接近其价值，改变了群众对“稳定”价格的旧观念，逐步适应价格随价值和供求变化的情况。

田军同志在这本书中，对我国价格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本书的特点是：对价格改革的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作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阐述；对一些长期争论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书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收集和研究了我国近年来价格改革的情况和问题，并且进行了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探索，力求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评价，因此读起来有时代感。这对一个青年研究人员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价格改革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涉及千家万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对价格改革的研究，不是写一本书就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作者和广大价格工作者进一步完善，进一步补充，进一步提高。

王振之

1985、7、1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价格改革势在必行	(3)
第一节 我国价格不合理的状况及形成原因	(3)
第二节 不合理的价格所造成的危害	(9)
第二章 价格改革的理论基础、方向与战略	(21)
第一节 关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 是价格改革的理论基础	(22)
第二节 价值规律的作用与价格改革	(26)
第三节 价格功能与价格改革	(31)
第四节 价格改革的方向与战略	(37)
第三章 关于价格体系的改革	(48)
第一节 理顺价格体系的基本原则	(48)
第二节 农产品价格体系的改革	(62)
第三节 工业品价格体系的改革	(75)
第四节 第三产业价格体系的改革	(87)
第四章 关于价格管理体制的改革	(96)
第一节 建立新型的价格形成系统	(96)
第二节 建立、完善价格监督系统	(113)
第三节 建立、健全价格信息系统	(123)
第五章 经济改革时期的价格总水平与人民生活	(132)
第一节 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意义	(132)
第二节 经济改革时期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	(136)
第三节 如何控制价格总水平上涨	(142)

第四节	价格改革与保障人民生活	(159)
第五节	开展社会心理研究、积极推进价格改革	(165)
后 记		(170)

前 言

在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经济改革已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劲的洪流，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以至对整个世界经济面貌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自五十年代以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自身的建设发展中，先后从不同方面和在不同的程度上，认识到了经济改革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要。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旺盛生机所在。

经济改革无论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社会工程，而其中价格改革又是更为艰难、也更为世人所瞩目的一项重要改革。我国目前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也是如此。

价格改革之所以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所决定。无论主观上愿意承认与否，当今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一可以超越商品经济阶段。只要是商品经济，作为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的价格等就是最基本的经济形式，价值规律就必然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社会主义经济现实来看，价格对于国民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如基建投资，生产发展，对外贸易，以至人民生活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通过自身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灵活反映，客观上调节着社会经济活动。价格的合理与否，对于国民经济能否正常顺利地发展，关系十分重要。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证明，价格改革成功与否都与其整个经济改革的效果如何有着重要的联系。价格关系是否基本理顺，是经济改革是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志，从我国来看，一九七九开始了以联产承包为主体的农村经济改革，后来又逐步转移到以提高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的城市经济改革上来。同时，在财政、金融、物价、工资、物资等各个方面的管理体制上，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是从各项改革的进行情况来看，无论是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还是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提高，或者工资、税收、信贷等各方面的进一步改革，都受到价格的制约，价格改革已成为整个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对于这一点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充分重视。本书也正是出于以上的考虑而写作的。

本书作为一本论述价格改革的专著，遵守两条基本宗旨：一是革命性，即力图说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以至整个生产关系的变革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没有定式，它可以在我们手中发展和创造；而且这种改革与创造的过程不是一劳永逸的，真正成功的希望在于不断的改革之中。

二是实践性，即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问题、找出原因、研究对策，走一条中国式的价格改革和经济改革的道路。

我们的改革刚刚起步，那么对于改革的研究也很容易带有局限性，加上本人水平有限，书中可能会有许多不妥之处，恳求各位读者给予批评。

田 军

1985年6月于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第一章 价格改革势在必行

第一节 我国价格不合理的状况及形成原因

我国的价格不合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价格体系不合理，即各种商品的比价和差价紊乱，该贵的不贵，不该贵的反而很贵；形成了一种难以促使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价格结构；二是价格管理体制不合理，这主要体现在价格管理权限的划分、价格管理形式、以及经济的或行政法律的手段运用等方面，在商品价格的形成方法上，也缺乏科学性，不适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以上这两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形式，后者是前者的内在原因，我国价格不合理状况的逻辑起点在于价格管理体制的不合理。

我国旧的价格管理体制的特点是，管理权限高度集中、管理范围包罗万象、管理方法过于僵死。这种价格管理体制是伴随着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而产生、发展的，是在我国特有的社会经济土壤上逐步生长形成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社会主义必须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列宁逝世以后由斯大林领导下的

苏联建立起来的。但是斯大林的错误在于，把当时历史条件下而且是在苏联一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体制，看作是普遍适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模式。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来看，其主要特征是：否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实行高度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成的过程中，由于五十年代苏联经济体制的影响，无论是计划管理体制还是价格管理体制，都深深地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

同时，我国的经济体制还受到了在我国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因素的影响。因此，我国的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土洋”结合的混合体。在这一点上，应该恰当地估计“洋”即苏联模式的影响，不能笼统地把我国经济体制都说成是从苏联照抄照搬进来的。这个“土”的传统因素主要是老解放区和过去革命根据地管理经济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中有许多可贵的东西，但从总体上看是一种非商品经济的产物，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长期处于被分割、被包围的状态，形成了自给自足、各自为战和供给制的传统。在建国初期，我国的劳动生产力由于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很低，国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解决人民的温饱，只能对有限的生活资料采取配给式的分配方法，这就需要依靠行政手段，自下而上的集中，自上而下的计划分配，而高度集中的固定价格制与配给制又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

在我国经济体制的形成中，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土传统”和“洋模式”以外，也有一些东西是在新形势下的发明创造。解放初期，我国面临着生产瘫痪、市场混乱、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国民党政府垮台之前为了筹措资金，发行了大量货

币，造成通货恶性膨胀，市场物资奇缺，人民蒙受了极大痛苦。解放以后，人民群众渴望稳定物价，恢复市场秩序，重建国民经济。党和人民政府顺乎民心，采取了果断措施，建立了强有力的国营和供销社商业系统，控制主要商品，并实行了金融管理和市场管理。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公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管理，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以集中国家的财力物力，战胜财政困难，稳定物价。

在所有制方面，我们没收了官僚资本，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并迅速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国家占有主要生产资料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为了恢复被长期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为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国家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由过去的“统一领导，分散经营”，改变为“统一领导，统一管理”，逐步建立了自上而下的通过指令性计划指标安排生产、流通、分配的计划管理体制。与此相适应的价格管理体制也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单一形式的国家统一定价等特点。

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下，不仅在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方面，而且在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物资管理体制、劳动工资体制、价格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集中统一的趋势。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重建国民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人民群众有了—个和平的环境，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又得到了土地和就业机会，劳动积极性

空前高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加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我们在建国初期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那种“共产党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的谎言被铁的事实粉碎了。

我们的党和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然而，正是这种胜利的喜悦使党内的许多人昏了头脑，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猖獗起来，一些人过分地相信人的主观作用，过分地相信国家行政手段的力量，片面地强调集中的好处，而忽视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与强制性，忽视了经济机制的内在机能，集中统一的欲望愈益强烈起来。“一五”末期，出现了所有制趋向单一和中央集权过多、企业自主权过小的问题，这些都影响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

当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矛盾开始变得突出的时候，党中央也有所察觉，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刘少奇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陈云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中，都对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改革的建议和设想。1957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要求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包括扩大地方的价格管理权限。

但是，当时对于高度集中的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弊病，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改革的着眼点主要是放在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上，而没有把扩大企业自主权放到重要地位。特别

是在“大跃进”中采取了过多、过急地下放经济管理权的改革措施，引起了宏观失调，造成经济上的混乱。再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我国经济遭受了灾难深重的打击。在扭转这种局面的时候，我们比较多地强调了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以克服经济困难，恢复国民经济。这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且我们在农村也采取了一些灵活的作法。但中央集权领导的加强，客观上限制了企业的活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左”的极端，把商品生产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等只是被作为大批判的靶子，才在我们的语言中被保留下来。

行政管理的范围越来越宽，经济生活越来越不正常，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路子越走越窄。在价格上，管理权限越来越集中，出现了越管越多，越管越乱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产品的价格，既不反映该产品生产中成本的变化，也不反映市场上供求状况的变动，基本上处于冻结的状态之中。这就使价格失去了其本身在国民经济中应有的作用，并使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状况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开始着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价格上，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体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和改革。但是，由于价格上积欠的问题很多，局部的调整和改革难以明显奏效，而大幅度的全面调整和改革又受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各个方面的制约。因此，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状况目前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